

川大世界史论丛

原祖杰 吕和应/主编

RESEARCH O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德国现代史学  
/ 探微

吕和应 冷金乘 李明彤◇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winshare 文轩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请扫描微信二维码  
了解更多资讯

上架建议：社科·世界史

ISBN 978-7-220-10123-6

9 787220 101236 >

定价：42.00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现代史学探微 / 吕和应, 冷金乘, 李玥彤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12  
(川大世界史论丛/原祖杰, 吕和应主编)  
ISBN 978-7-220-10123-6  
I. ①德… II. ①吕… ②冷… ③李… III. ①德国  
—现代史—研究 IV. ①K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84511 号

DEGUO XIANDAI SHIXUE TANWEI

## 德国现代史学探微

吕和应 冷金乘 李玥彤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谢寒 蒋科兰  
张迪茗  
戴雨虹  
舒晓利  
王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hs@sina.com](mailto:scrmch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10

字 数

229 千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123-6

定 价

42.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 目 录 |

## 序 言 /001

### 第一章 殊途与同归：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006

一、康德与赫尔德的交往和争论/007

二、殊途：经验、理性与目的论/041

三、同归：人的进步与实现/049

四、启蒙的张力/064

### 第二章 “研究”与“表现”并重：兰克处女作 的新诠释/070

一、第一版序言的结构/073

二、兰克时代的“研究”体制/080

三、复兴古典历史书写的尝试/085

四、时代误置的解释/089

### 第三章 远交近攻：德罗伊森与同时代的学科之争/094

一、从语文学向历史学的过渡/097

- 二、哲学与新兴学科的相互批评/112
- 三、新旧史学理论之间的竞争/120
- 四、学科之争的延续/132
- 第四章 文化史家与“边缘人”：兰普雷希特的自我定位与他者评价/135
  - 一、艺术还是科学？/137
  - 二、文化史的路径和特征/143
  - 三、“反叛者”与“边缘人”/153
  - 四、同盟者与后继者/161
- 第五章 危机与克服：历史主义在 20 世纪/168
  - 一、文化危机与历史主义危机的形成/171
  - 二、特勒尔奇克服历史主义危机的方案/183
  - 三、梅尼克与历史主义的正名/191
  - 四、卡尔·波普尔与历史主义的新内涵/208
  - 五、伊格尔斯及其历史主义谱系/223
- 第六章 制作实在论者：20 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242
  - 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前格言化阶段/244
  - 二、新康德主义者的兰克形象/248
  - 三、被移植的格言/256
- 参考文献/266

## | 序 言 |

本书书名中所谓的“德国现代史学”主要是指18、19世纪之交至1945年这段时期的德国史学。德国现代史学成就巨大，影响深远。赫尔德、威廉·洪堡、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为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兰克、德罗伊森、布克哈特和梅尼克等史学大师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现代史学家。然而，在光鲜的“履历”背后，德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诸多坎坷。我们不打算继续论述德国现代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而是希望展现德国现代史学自诞生以来遭遇的种种争议、挫折和敌视，以及这些不利因素如何塑造了它的史学形态和观念。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但六章内容都围绕这一主旨展开。

第一章“殊途与同归：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主要考察康德与赫尔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以及思想上的交锋。康德与赫尔德曾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发表后，他们发生争论并成为终生的论敌。这场争论帮助康德完成

他的批判哲学体系，而赫尔德在继续反对康德的同时自己也越来越接近启蒙。在认识论方面，康德和赫尔德都坚持经验的准绳，但赫尔德相信的是直观经验而且有时夹带想象的色彩，并且主张外在目的论。在关于人的认识方面，尽管存在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重视国家和政治与重视民族和文化的差异，但他们都热衷于人类学，都向往着人类的进步，都秉持共和主义的政治态度，而且康德认为自己的观点包含了赫尔德的理论旨趣。康德与赫尔德的对立与统一体现了启蒙的学院与通俗、思辨与常识、理论与直观的张力。

第二章“‘研究’与‘表现’并重：兰克处女作的新诠释”主要探讨了“研究”与“表现”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的地位。兰克这部处女作虽然不够成熟，但却让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从此以后，德国现代史学开启了兰克时代。后世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评论众多，对第一版序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以及附录《近代史家批判》的评论尤甚。参照兰克回应海因里希·利奥的文章可以发现，第一版序言存在一个由“意图”“研究”与“表现”三部分构成的“隐微”结构；在“研究”与“表现”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兰克主张“研究”与“表现”并重。兰克坚持这一主张，究其缘由，一方面与那个时代的“研究”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复兴古典历史书写的宏愿有关。关于兰克的既有研究各执一端，没有注意到其上述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强调“研究”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

第三章“远交近攻：德罗伊森与同时代的学科之争”重点讨

论了德国现代史学诞生的思想史语境。在德罗伊森时代，现代人文学科逐渐成型，学科之争频繁上演。首先，在19世纪初，语文学与历史学一度十分亲近，历史学在借鉴语文学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德国现代史学，但随着语文学和历史学形成了各自的职业认同，二者便日益疏远。其次，黑格尔对语文学和历史学等新兴人文学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除了“文本批判”之外，语文学和历史学更应该重视文本的教化功能；为证明自身的“科学性”，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再次，德罗伊森批判地继承了语文学理论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借此向各种旧式史学理论发起挑战，以便为德国现代史学奠定方法论基础。在德罗伊森晚年，由于代际更替和范式转移，学科之争仍在继续。

第四章“文化史家与‘边缘人’：兰普雷希特的自我定位与他者评价”。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史学界学科化、专业化、以政治史为核心研究领域的背景下，卡尔·兰普雷希特专注于史学方法的探索，通过区域史及德意志史研究实践拓展了“文化史”研究路径。兰普雷希特“文化史”的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汲取以心理学为核心的多学科前沿成果，研究含括经济、政治、艺术、社会等视角，研究对象以区域研究为基础、以“民族”替代彼时学界主流观点中的“国家”作为史学基本单位，并意图经由以德意志民族为基础的差异性研究，探讨人类史等具有普遍性的史学课题，因其与德意志彼时学界主流观点及方法相悖，由此引发了19世纪末有关史学特征及方法论问题的“兰普雷希特之争”。此

外，因著作中的谬误、非主流的史学路径等缘由，兰普雷希特被部分同时代及后辈学者评价为“边缘人”，但其部分史学方法与美国“新史学”派遥相呼应，亦对此后多领域的史学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

第五章“危机与克服：历史主义在 20 世纪”。20 世纪初，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历史主义”理解为相对主义的一种变体，而特勒尔奇和梅尼克不赞同他们以相对主义来贬低历史主义。特勒尔奇重视历史学方法在神学中的运用，他试图消除“历史主义”的贬义，并以“文化综合”来应对历史主义可能产生的相对主义危机。梅尼克则高举历史主义大旗，撰写了历史主义的兴起史，求助于超验的绝对者来克服这一危机。作为流亡海外的犹太裔学者，波普尔的历史主义叙事向来受到忽视和误解，其实，波普尔的 historicism 概念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他对 historicism 的批判表明，他希望借助理性经验主义来克服 historicism 制造的宏大叙事。伊格尔斯从战后德国历史反思的角度来批判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应该为德意志“特殊道路”及其造成的恶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显然，伊格尔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已不同于历史主义在 20 世纪初遭遇的相对主义指摘。

第六章“制作实在论者：20 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自 20 世纪初以来，“批判的历史哲学”总是将兰克的史学思想简化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在德国的传统中，文德尔班、西美尔和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将兰克视为“历史实在论”的典型代表，其依据就是兰克声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其他欧美国家，克罗齐、柯林武德、沃尔什和马鲁等历史哲学家同样将兰克的史学思想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画上等号，塑造了与新康德主义者类似的兰克形象。与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一样，上述历史哲学家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格言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由我和两位学生共同完成，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由我撰写，第一章由冷金乘撰写，第四章由李玥彤撰写。本书的六个章节最初都以论文形式写成，组合起来结构虽不够完美，但所幸摆脱了一般通论性著作大而化之的论述模式，故取名为“德国现代史学探微”。

本书出版受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吕和应

2019年10月

## 第一章 殊途与同归： 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

康德与赫尔德都是人类历史上开创性的思想家。康德被称为西方思想史上的“蓄水池”，他在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无可争议；而赫尔德深远地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传统。赫尔德曾是康德的学生，虽然他们的精神气质、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他们在认识之初尚能互相包容。但在1785年康德就赫尔德的新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写了一篇反对性的书评之后，他们开始了公开的争论。在这场争论及其余波中，康德与赫尔德思想上的特点和差别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18世纪末期德国知识界处于激烈的风云变幻之中，康德与赫尔德代表了启蒙时代的两极，但他们又共享着某些共同的前提，所以他们又处于同一场启蒙运动中。

本章第一节主要对康德与赫尔德交往和争论的过程做思想史的梳理。第二节主要分析他们认识论上的差异，我们将会看到，他们虽然分享相同的前提，但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第三节主要分析他们

对人类的认识，包括人类学、历史、社会政治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虽然他们前提不同，却走向了根本上一致的结论。最后，我们在启蒙运动的视域下探讨康德与赫尔德思想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 一、康德与赫尔德的交往和争论

### 1. 亦师亦友：1762—1784

1762年8月，18岁的赫尔德来到普鲁士的哥尼斯贝格。康德赏识这个有才气的年轻人，允许他免费听自己的课。赫尔德可说是康德的崇拜者，他把康德的讲课内容改写成诗，而康德也在课堂上当众宣读过这些诗。留存至今的赫尔德的听课笔记也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康德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在哥尼斯贝格，康德与赫尔德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人回忆，赫尔德成了康德最喜爱的学生，康德曾去他家中拜访，他们也一起散步，康德还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给他看自己的手稿。<sup>①</sup>

不过，赫尔德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赫尔德后来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回忆起他当时听康德的形而上学课的感受：

在这个了无生命迹象的概念世界，在这个无底的死域  
中，我的灵魂很不好受。在每一堂形而上学课以后，我就和

---

<sup>①</sup> John H.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141.

一个诗人跑到空旷的地方，或者阅读卢梭的书或者类似的作品……以减弱或摆脱那些印象，因为它们对我而言是一个折磨。<sup>①</sup>

可见，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赫尔德整个的思想气质就与这种形而上学格格不入，他对康德的热情也更多是奔着康德所讲授的内容的重要性和康德的声誉。而康德也不怎么认同赫尔德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但对他比较宽容，希望他夸大和多愁善感的文风与他性格中的激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退。据说，康德曾针对赫尔德在哥尼斯贝格的报纸上发表的纪念耶稣受难节的诗句发表评价说：“当热血沸腾的天才冷静下来之时，他一定会以其巨大的才能成为一个更为有用的人。”<sup>②</sup>

在哥尼斯贝格时，赫尔德与哈曼的关系也很重要，他跟随哈曼学习文学、神学和英文，而且赫尔德离开哥尼斯贝格后，他们还保持着长期的书信往来。此时的康德尚处于“前批判时期”，康德对赫尔德造成的影响也固然是前批判时期的特征，比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经验主义、伦理的反认知主义、分析的方法等等，而最大的影响是此时康德的教学理念，即“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作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sup>③</sup> 赫尔德把康德看作他“最好的老师”，称哈曼为他的“导师”，而他则自称是阿尔西比

---

<sup>①</sup> 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sup>②</sup> 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曹俊峰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sup>③</sup> 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139页。

亚德斯，面对着两个苏格拉底，一个是神秘的，一个是辩证的。<sup>①</sup>

在哥尼斯贝格，赫尔德写了一篇论文《论存在》（*Versuch über das Sein*），主要针对康德的文章《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而作。在这篇文章中，赫尔德认为感性是人基本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观念的基础，感性的观念才是最确定和最清晰的。康德认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明晰的，赫尔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从直觉经验的角度来看，存在是很明晰的。<sup>②</sup>《论存在》既奠定了赫尔德这一生的思想基调，也预示了后来他与康德的争论的基本样貌。康德似乎对赫尔德的这篇习作持开放态度，他发现赫尔德在新的方向上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并且也对赫尔德产生了好感。<sup>③</sup>

1764年，赫尔德离开哥尼斯贝格前往里加担任教会学校的助教，后来成为牧师。康德给赫尔德的寄语：“不要太拘束于他（注：指康德）的书本和文字，应该效法他的为人，他自己是个很社会化的人。一个人只有在真实世界中才能得到教育。”<sup>④</sup> 这可以理解为康德不愿自己在赫尔德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在课堂上讲述哲学概念的学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时的康德确实是哥尼斯贝格社交圈的灵魂人物，一个“优雅的硕士”。很多年以后，赫尔德说自己始终记得康德给他的这段寄语。<sup>⑤</sup> 1766年，康德出版《视灵者之梦》的过程中曾

---

<sup>①</sup> Frederick C.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179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2.

<sup>②</sup> 陈艳波：《走向人道——赫尔德历史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44—48页。

<sup>③</sup> John H.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p. 140.

<sup>④</sup> 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169页。

<sup>⑤</sup> John H.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p. 144.

把它寄给赫尔德阅读，而赫尔德也在哥尼斯贝格的报纸上对这个作品发表了赞许的评论，还促请他的熟人去听康德的讲座。<sup>①</sup>

1768年5月9日，康德给赫尔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康德为赫尔德的最新作品《德国新文学评论断片集》和《批判之林》取得的反响感到高兴，甚至还表示自己有一些为人师表的虚荣心；康德预料他会成为“诗艺的大师”，希望他不为情感的热烈冲动所驱使，而是寻求安宁，而这正是神秘主义的对立面；只有安宁这种心灵状态才对世界有益，在这方面，蒙田的地位最低，休谟的地位最高；康德透露自己正在进行道德形而上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完成；最后康德让他转达对贝伦斯先生的问候，并说格曼会到他所在的里加学校<sup>②</sup>，而这似乎才是康德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此时康德依然赏识赫尔德，虽然康德自己不写作文学，但喜好阅读，自己也常出现于哥尼斯贝格文学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似乎在担忧赫尔德有可能走向神秘主义。这个担忧很快就应验了。

同年11月，赫尔德回信，这封信语气热情洋溢，也十分客气，但许多话显得过于心直口快。赫尔德在回信中竟然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蒙田的喜爱，以及对休谟的耐心渐失。蒲柏是康德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康德在信中也提到蒲柏，而赫尔德却在回信中说自己的诗作很难看到蒲柏的影子。当然不是赫尔德有意跟康德过不去，因为他把亦师亦友的康德更多地看作是朋友，他不会唯唯诺诺地遵从老师的教导，而是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赫尔德也不奉承康德的作品，

---

① 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164页。

② 《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4页。

他说把康德 1764 年发表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与埃德蒙·伯克的《对崇高感和美感之起源的哲学探讨》比较起来看的话很有趣。赫尔德还表达出一些对康德的人类学观点的疑虑，而人类学也是自己喜爱的领域。最后赫尔德衷心期望康德能给他回信。<sup>①</sup>

实际上赫尔德在别处对康德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说：

康德整个是一个社会观察家，整个是一个完美的哲学家。……人和人性之中的伟大和美丽、两性的气质和动机、德行，以及还有民族性；——这些就是他的世界，他非常之精密地注意到了细微的阴影，非常之精密地分析了最为隐蔽的动机，并且非常之精密地勾划出了细微的遐想，——他整个就是人道之优美与崇高的哲学家，在这种人性哲学上，他是一位德国的沙夫茨伯里。<sup>②</sup>

康德没有回复赫尔德，看来他并不认为还有回信的必要，而且赫尔德这样直接地违背他的期许，未免会让康德感到失望。这一次信件往来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康德更多地把赫尔德视为自己的学生，而赫尔德则把康德看成自己的朋友。在这之后，康德与赫尔德再没有通信过。不过在哈曼与赫尔德的长期信件往来之中，哈曼经常在信中提到康德的生活和学术近况，所以赫尔德对康德此后的情况不至于太过陌生。

---

<sup>①</sup> Kant,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6—99.

<sup>②</sup> 转引自何兆武：《一条通往康德体系的新路——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第38页。人名翻译有改动。

1770年，康德取得哥尼斯贝格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职位，而赫尔德从法国旅行归来去了斯特拉斯堡，撰写《论语言的起源》并成为柏林科学院征文比赛的唯一获奖作品，一年以后他到布克堡担任宗教法庭顾问。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赫尔德与康德的关系中的不安迹象出现于1774年赫尔德出版《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之后。赫尔德认为自己在《创世纪》的故事中看到了摩西对一种神秘象征符号的解释，人类的所有艺术和科学都从这种解释中找到了起源。哈曼看了这部书之后十分高兴，把它送到了康德那里，希望由他这位美感和崇高感的“法官”来“审查”。<sup>①</sup>而赫尔德正确地猜测到，“这位普鲁士高雅趣味的手执标枪的首领”将“对此书怀有反感和愤怒之情”。<sup>②</sup>1774年4月6日，康德写信给哈曼，他陈述了自己对该书的理解，并请哈曼帮忙解释。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根本没有器官听直观理性的诸神语言。至于我按照逻辑规则从普通的概念中能够拼出的东西，我还大可接受。我也无非是要求理解作者的主体，因为以其全部的尊严清晰地认识它，并不是我所要求的事情。”<sup>③</sup>在康德看来，赫尔德是想证明上帝以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在一切认识的开端教授给了第一个人，而证明的方式则是把《创世纪》以隐喻的方式跟一个远古符号结合起来。康德最后表示，他很担心这个文献的重建者即赫尔德的没有胜利的凯旋能长久持续，因为熟悉古代档案的东方学家不会同意赫尔德的论断。<sup>④</sup>而康德的朋友希佩

---

① 《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李秋零译，《宗教与哲学》2013年第二辑，第30—31页。

② 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223页。

③ 《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第29页。

④ 《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第32—34页。